

## 朝向世界的台灣文學研究四人談 工作坊紀要

### Report on the Four-Way Conversation on Globalizing Taiwan Literature Workshop

時間：2024 年 3 月 22 日（五）15:30-17:3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  
主辦：台灣文學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主持人：翁聖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與談人：史書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Irving and Jean Stone 人文講座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講座教授、教育部玉山學者）  
林芳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  
邱貴芬（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名譽教授）  
黃美娥（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責任編輯：林芳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  
文字整理：黃茂善（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碩士生）

#### 一、台灣文學的「國族性」如何成為朝向世界的助力或阻礙？

翁聖峰：

謝謝今天四位重要的學者還有各位來賓，除了本國的學者，也有外國的朋友，像德國的蔣永學先生，台灣也有從金門、新竹其他縣市來的朋友。等一下六分半會有提示鈴，希望在七分半結束，壓縮在三十分鐘內，剩下二十分鐘來對談。工作坊第一個主題是台灣文學之於國家的角色及台灣文學體制化，在此過程中的優勢及可能面臨的挑戰，或是與其他領域進行對話。第一位報告的學者是邱貴芬教授。

### 邱貴芬：

這一場工作坊是書美教授給的題目，還是芳玫教授提出的？基本上有三個題目，第一個題目是台灣文學的國族性如何成為世界的助力或阻力；第二個問題是可否跳脫國家的框架，以類型、讀者、語系、空間性／時間性這些概念來取代國家；第三個問題是文學史如何成為世界史，這些問題是我們四人的功課。

第一個問題其實涉及國際對於國族主義的戒心，這當然有其歷史脈絡。我在西方發表論文時都有一個感受，國際讀者對於 *nationalism* 深懷戒心，太強調 *national identity*，往往不利於跟讀者對話，確實造成一些困難。然而，「台灣」真的是台灣文學進入世界的阻力嗎？第二個問題似乎有個假設：用類型、讀者、語系、空間性這些概念來取代台灣，會比「台灣」更能夠讓台灣文學與世界銜接。真的如此嗎？與其憑空想像和辯論，不如以實際的案例來作為討論的基礎。

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吳明益，他是非常重要的環境文學作家，也獲得不少世界各地讀者的迴響，我在我的專書《台灣文學的世界之路》<sup>1</sup>裡面以 Goodreads.com 這個讀者留言和評分的閱讀網路平台來研究吳明益的國際能見度，發現確實有許多來自不同地方的讀者對吳明益感興趣。吳明益成為世界文學作家的這個過程有位很重要的貴人：《複眼人》出版的時候，經紀人譚光磊邀請勒奎恩（Ursula Le Guin）為《複眼人》寫推薦語，這位科幻文學大師的推薦，對於吳明益進入世界文學的場域，我認為是有很大幫助。勒奎恩的推薦語這麼說：「We haven't read anything like this novel. Ever. South America gave us magical realism – what is Taiwan giving us?」<sup>2</sup>當勒奎恩提問「What is Taiwan giving us?」，台灣顯然是個助力，讀者想要知道台灣的作家到底寫了什麼？與其他國家的作家相較，有何特別的貢獻？我認為這意味當我們進入其他文類，諸如世界的環境文學或科幻文學時，讀者仍會關注不同地方、區域及當地社會的特性。這麼看來，「台灣」不是阻力而是助力。另一個更明顯的案例，是 LGBTQ 文學。上周在台師大曾秀萍教授舉辦了一個 LGBTQ 的研討會。顯然並非所有的 LGBTQ 文學或電影都一樣，大家會注意到由於社會環境以及法律的不同，台灣的 LGBTQ 文學或電影與同樣屬於華語語系的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的 LGBTQ 華語文學或電影都各不相同。可見試圖以另一個概念——無論是語系（如華語語系）、主題（如酷兒）、或文類（如環境文學、科幻文學）都不可能完全迴避、去除 *national identity* 涉及的問題。

<sup>1</sup> 邱貴芬，2023，《台灣文學的世界之路》，台北：政大出版社，頁 53-54。

<sup>2</sup> The Grayhawk Agency. (2013). Ursula K. Le Guin Recommends Wu Ming-Yi's THE MAN WITH THE COMPOUND EYES. <https://grayhawk-agency.blogspot.com/2013/07/ursula-k-le-guin-recommends-wu-ming-yi.html>.

我的第二個案例是最近我接到的一個邀約。任教於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的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期刊主編 Christopher Rosenmeier 教授正在進行一個大型的華文文學資料彙編的計畫，擴增 *Brill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希望我負責台灣文學詞條，邀請各地專家學者來參與撰述。這套重要的 Chinese literature 指南在 1988 年的時候曾經出版，設定的時間範圍是 1900 年到 1949 年，針對入選的重要中文作品，邀請中文文學研究專家撰寫介紹。這是國際間非常重要的讀者 Chinese literature 的指南，提供國際讀者和研究者一個中文文學研究的入門。英文的 Chinese literature 可理解為中國文學，但也可泛指華文文學。在 1988 年的初版，指南以中國文學作品為主，沒有台灣文學的詞條，也沒有台灣學者參與的空間，這個指南應指中國文學的指南。初版指南以文類劃分為四個 volumes，在介紹裡特別說明提到該指南展現了「European Scholarship at its best」。

現在進行中的擴增版本，以地區區分作家背景：China、Hong Kong、Taiwan、Other，台灣之所以能夠進入這個重新出版的 *Brill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主要因為這些作品來自台灣。強力主張台灣文學是 Sinophone literature 而非 Chinese literature 的書美一定對 Chinese literature 這個概念有所批判，但是接到這樣的邀約時，我面對的困難在於如何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中爭取「台灣文學」這個概念的國際能見度。我不參加的話就什麼都沒有，Taiwan literature 就不見了、缺席了，而參加的話，或許還有機會重新定義 Chinese literature，將其意思轉化為華文文學。現場有許多在國外從事台灣文學推廣的學者，都面臨到相同的挑戰。新版本的指南劃分了四個地理類別：中國、香港、台灣、其他。Malaysia 就屬於 other，這是主編的決定。以上是我就台灣文學國際發聲的兩個實際案例來回應這個論壇的第一個和第二個問題。我先暫時講到這裡。

**翁聖峰：**

謝謝邱貴芬教授，雖然她沒有完全講完，但是她講了兩個很重要的案例，在對談的時候可以再交換意見，接下來請黃美娥教授報告。

**黃美娥：**

今天的與談人，還有各位在場的老師、同學們大家午安。非常感謝書美教授跟芳玫教授的邀請，有機會來參加今天的工作坊。在四位與談人當中只有我是 local 的，可能我對於國外的台灣文學研究，沒有辦法做到深刻的觀察，分享的是我從 90 年代以來在地從事台灣文學研究遇到的一些挑戰，或是我因應的思考。

我不知道題目是否為芳玫教授設計的，我認為她的擬題有幾層意義：首先暗示研究

進程的推移，也就是 90 年代開始的時候，是從本土化、主體性強調，來到今天所思考的，是提醒我們去想國族性的問題，而國族性當中的命題又牽涉到幾個關鍵詞彙，如國族認同，所以我們在第二題可能會認為它指涉的很像是一種國家文學。在這裡面當然也面臨到國族性怎麼樣在世界發展過程中的助力或者是障礙，也就是說芳玫教授題目的擬題，將牽涉到第二個階段：我們從 90 年代以來，到今天要把更多的精力從在地移動到世界。所以我認為今天這個題目，就研究範式的轉換過程，可能隱約有這樣的一種動力存在。第二個我所想談的是，國族性到底是助力還是阻礙？

首先我先分享阻礙的部分，所有人可想而知，包括我們今天台灣的政府、官方機構當中，只要到國外去推動台灣文學的時候，如果該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邦交關係，或是穩定密切的來往，其實都會對於台灣的存在或出現很敏感，甚至於本來應該在官方場所的互動，結果安排到飯店、咖啡廳等。也就是說，在某些部分，國族性暗示我們沒有辦法很公開的、自由自主的去從事推廣。我個人曾經有個到加拿大開會的機會，在我交了題目之後，主辦單位詢問我是否能取消發表，因為我討論台灣國族認同的問題，所以最後沒有成行。還有一次剛好我在現地，是 2014 年的歐洲漢學會議，因為蔣經國基金會的名稱出現在會議宣傳手冊，中國國家漢辦主任許琳當場把手冊撕掉。我想對於我來講，國族絕對是我們投入台灣文學研究之後，我們身上可能要背負的十字架或重荷，那個重荷是我是台灣文學研究者，我可能就有機會或沒機會跟別人互動。

首先我從這裡來談，當然我想今天的討論可能會期待更進一步的思考。所以就台灣文學本質而言，我在想的是台灣文學的國族性要如何被看待跟詮釋？從 90 年代以來，台灣文學的國族性一開始是被拿來跟中國文學爭奪主體，著重本土論跟主體性。然後到了陳芳明教授在台文界推動「以東亞作為方法」時，就已經不是跟中國文學爭奪主體，而是直接把台灣推向成為東亞的一份子，迴避與中國之間主體糾葛的問題，這是以東亞作為框架的意義。後來有史書美老師推動了華語語系，或是這幾年邱貴芬老師的世界文學研究，這些都是直接從在地、本土，來到世界性。

換句話說，我想 90 年代以來，台灣文學的國族性已經常與國際性、世界性綁在一起，那麼這個綁在一起，就不單純是從國族認同來討論台灣國族性的問題。幾年前我主編《世界中的台灣文學》(2020)<sup>3</sup>，當時我也在想，台灣文學的國族性可否連結世界性？它既有一個台灣國家文學的輪廓，又該如何將國族跟世界的關係凸顯出來？這是在思考的問題；也嘗試從台灣自身、從內部當中去努力。

從外部來看，我遇過很多經驗。有一次我遇到一位上海很知名的學者，他還到德國

---

<sup>3</sup> 黃美娥編，2020，《世界中的台灣文學》，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海德堡教書。他問我的研究領域，我說台灣文學，他就說妳做邊疆文學研究，我一時愣住，不知道怎麼跟他繼續對話。另外這幾年也常看到，很多中國的學者到了國外讀學位寫書或博士論文時，他們注意到台灣，所以會在其中一章放入台灣，這種現象非常普遍；此外，我也遇過韓國知名學府的學者，他問我說台灣文學為什麼不用「中華民國文學」，那位學者說「中華民國」對很多的韓國人而言是有情感的，他們在獨立運動期間受到中華民國很多的協助，這是我遇到的第二個問題。今年一月我去東京開會，東京的學者告訴我，韓國友人知道她是台灣文學研究學者，因此詢問她台灣文學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什麼？她和在場的其他人就都說是「政治小說」。且不論這個答案我們接不接受，但是說明了現階段國際政治緊張的局勢之下，他們在想及台灣文學時，顯然連結到了台灣的政治，也就是國族認同的問題跟政治性被綁在一起。

從這幾個經驗，我想問幾個問題：第一，台灣文學被包括在中國文學之內，這是一種助力還是阻礙？當全世界很多人還不了解台灣文學的時候，我們就這樣被寫進去，跟剛剛貴芬老師的案例一樣，然後呢？貴芬老師的案例是並存，而我們可能是被寫為專書其中的一章。另外則是，中國學者的台灣文學研究成果累積越來越多，他們跟世界交流，這對台灣文學是助力還是阻力？第二，台灣要保持國族性的彈性跟開放嗎？中山大學近期辦過一個論壇，名字很有意思，叫「中華民國作為共業」，所以中華民國跟台灣是命名學的問題嗎？再來國際政治指向我剛才說的，台灣的政治性與國族性，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會出現：如果國族性是我們看重的，那麼，在討論不同階段文學的時候，我們要什麼樣的國族性？這個國族性有沒有可能跟台灣性產生連結？然後我們在面對不同國家的時候，國族性的內涵指涉是什麼？在國族認同以外，還有沒有可能有其他可以涵蓋在這裡面？第三，世界到底有多大、有多遠？有多少內容物？如果就題目來看，世界就是國家的組合，而世界的層面涵蓋很廣。我想首先會牽涉外譯，有關讀者閱讀的問題；再來，我們可以透過學術推動，近年我跟亞洲的學者有一個跨國的學術社群，我發起邀請亞洲很多知名學府的老師參加，目前大概有 14 位，每一年在不同的地方舉辦會議。我的目的是以台灣為中心基點，去分享台灣的觀念，去討論亞洲文學的問題，當然這裡面也牽涉台灣的學術角色如何樹立的問題。

**翁聖峰：**

謝謝黃美娥教授提出許多實際的例子，以及不同層次的對話思辨。「台灣」跟「中華民國」會因為不同人的認定，而有很大的差異。再來請林芳玫教授進行報告。

### 林芳政：

主持人、在座各位與會的貴賓大家好。我想要提出「在地性就是世界性」，我們常常認為書籍要翻譯成英文，就可以讓國外的讀者讀到，或是把研究成果寫成英文參加國際會議。以上當然是很重要的一環，所以前面邱貴芬教授都已經提及，不過我想先從最基本的開始。台灣文學研究先重視自己本身的在地性，就會發現裡面充滿了世界性，曾經有段時間如黃美娥教授所說，台灣文學的主體性是為了對抗中國性，來說明台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但是到了當代的台灣文學研究，我認為從在地就可以發現世界。

以日治時期來看，有文言文、白話文、日文等不同語言及文體，我們現在所熟知的日治時期作家如張文環、王昶雄，他們的作品就是以日文書寫為主；以文言文來說，已經有韓國學者還提出「東亞漢字圈」的概念，<sup>4</sup>中國、日本、韓國、台灣、越南都使用文言文，日治時期作家如謝雪漁、魏清德、李逸濤等，都用文言文寫許多通俗小說。這些通俗小說的題材涵蓋全世界，有歐洲、美國、南美洲、非洲、東南亞，同時也受到西方偵探推理小說的影響，李逸濤曾把中國傳統的公案小說以理性、科學的角度，嫁接到西方的偵探推理小說，黃美娥教授是這方面研究的前行者。這些文言文寫成的通俗小說，很多年前已經輯成冊，<sup>5</sup>但如此多的研究資源，與之相對的研究學者卻不成比例，我認為非常可惜，這些作品顯現日治時期作家就開始使用文言文探討我們如何接觸現代性、如何與世界對話。

大家可能難以想像，一個台灣的文人，他會因為他也是當時報紙的記者，所以接觸到很多外面的資訊。他會去寫一個小說，內容是一位派駐在德國的英國外交官，當時是二戰的前夕，所以英國外交官可以觀察到德國的社會現象，同時德國有很多間諜在英國，所以德國、英國、比利時不同國家在角力。這篇小說應該也並非完全原創，或多或少是從日本對於國際形勢的想像，或是一些日文外電的報導裡拼裝組合。另外如謝雪漁曾翻譯過史考特（Walter Scott, 1771-1832）的詩歌《湖上美人》（*The Lady of the Lake*, 1810），他並非直接從英文進行翻譯，而是從入江直祐的日譯本《湖の麗人》（1936）進行日華翻譯。所以在日治時期，單看文言文就已經展現豐沛的世界性，現在要做的應該是，將過去的文學作品重新盤整，進而提出新的問題意識跟研究方法。比如說華語語系研究，可以讓我們去思考文言文作為一個連繫東亞，展現世界想像的途徑，特別是文言文的通俗文學，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是新住民文學，從 90 年代開始，很多東南亞移民來到台灣。有些是因

<sup>4</sup> 金文京著、金文京譯，2022，《漢文與東亞世界：從東亞視角重新認識漢字文化圈》，新北：衛城。

<sup>5</sup> 前衛出版社於 1998 年推出「台灣古典大眾小說」套書。

為婚姻，有些是因為工作，所以我們就有移民工文學獎。移工文學獎鼓勵在台灣的東南亞各國如越南、印尼的移民工，用他們的母語寫出他們在台灣的想法，得獎的人會認為我比台灣人還台灣，除卻因工作來台灣就業所寫的移工文學，另外移民而定居下來的稱之為新住民。新住民的第二代現在也步入青壯年，他們開始使用中文寫作，就會出現陳又津等新住民文學的作家。

台灣的人口結構不斷地在改變，有新的人進來，也有人移民到國外，比如陳思宏、賴香吟在德國，人口的流入跟流出，都造成台灣性不斷的重新被定義，也讓台灣本身的在地性，就已然具備世界性。各個不同國家的人到台灣，而台灣人又到世界各地，所以我們首先要把握住這樣的在地性，然後不斷的將研究主題、研究方法更新。

又好比說這幾年，非常盛行歷史小說。台灣有多重殖民的歷史，因此歷史小說有的談西班牙時期，有的談荷蘭時期，有的談日治時期。歷史小說的書寫是從當代的觀點去思考歷史，歷史小說也是藉由歷史來探究當代台灣人的認同是什麼。台灣有一種集體的欲望與渴望，不斷地跟自我及他人講什麼是台灣性、Taiwaneseness。所以台灣性未必是一個固定的台灣國族認同，而是究竟什麼是台灣人、什麼是台灣文化、什麼是台灣文學。我們一直有強烈的渴望，要跟自我及他人去解釋不斷在變動的台灣性，我的發言先到此，謝謝。

#### 翁聖峰：

謝謝林芳玫教授從日治時期台灣人跟世界的關係回答問題，或是世界跟台灣的不同族群除了華語、還有日文、文言文等不同形態進行不同對話，引起我們共同思考。接下來是史書美教授報告，史書美教授也是教育部的玉山學者。

#### 史書美：

感謝芳玫教授的邀請，來參加台灣文學學會和師大台文系合辦的座談會，今天有這樣的榮幸和台灣文學學會的歷屆會長，台灣文學研究界非常重量級的學者們，也是我崇拜的各位大咖的女學者們對談。大家都知道這幾位教授對台灣文學研究的付出，是用了整個生命力的那種付出，讓人敬佩和感動，所以我備感榮幸。

我對第一個問題的想法是：國族性和世界性是一體的，不是一體兩面，是一體一面，而這個認知有三個層次需要思考。回答這個問題，我先從本體論的層次著手：我對本體論的理解是很基本且實用的，不拘泥於西方哲學流派之間的爭辯，只是指涉存在和事物的本質。

在本體論的層次：「台灣是世界的一部分」。所謂為世界一部分的台灣，可以有兩個說法：它可能是固定的、靜態的、無心的存在，只是被拋入世界不得已存在而已；也可能是多變的、動態的、有心的存在。這兩種存在的差異，事實上只是角度問題，因為存在就是存在。我把它分為兩種，只是幫助我們思考，因為我們今天的大課題是如何促進台灣文學研究。分成兩種以後，我們就能夠選擇。我們選擇第二種模式的存在，就讓我們有功課可以做了。如果我們把台灣看作有心的存在，那它為世界構成的一員，不僅是參與世界，而是以一個能動體參與、創造世界，因此台灣和世界兩者是相互構成的。<sup>6</sup>

這裡牽涉到歷史觀，我舉一個例子說明：最近閱讀曹永和的著作，特別是《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我很佩服他運用各種外語，尤其是日語和荷蘭語，豐富台灣史的研究。其中他有一個歷史觀，認為台灣在史前時代原本是一個交通樞紐，作為東北亞和東南亞的連接點，但是由於人口流動和交通貿易路線的改變，到了日本的大和時代（3 到 6 世紀），台灣變成了一個「孤立閉鎖的部族社會」長達十個世紀。<sup>7</sup>直到 17 世紀，台灣才進入「歷史時代」。台灣進入歷史時代的動因，是因為這個時期台灣變成中日匯合貿易地，更重要的是歐洲航船的到來，在葡萄牙、荷蘭、西班牙、日本、英國的商船和海盜船的貿易和掠取行徑的過程，台灣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商業和軍事基地，因此荷蘭佔領台灣，和西班牙角逐、明鄭時期的到來等，這個都是大家熟悉的歷史。曹永和說，「至此，台灣才進入了『歷史時代』」。<sup>8</sup>就此而言，台灣從所謂的史前時代到 17 世紀，這段時間可說是一片空白，好像沒有這些外來者，台灣就不能進入歷史。曹永和不是沒有談 6 至 17 世紀的台灣，我在此僅對「歷史時代」這個有價值觀的分段法表示質疑。

我認為我們需要改正這樣的歷史觀，沒有外來者，並不代表台灣並不是世界史的一部分。研究原住民社會的學者們都知道，這樣的歷史觀，把原住民的歷史截斷成「接觸前」(pre-encounter) 和「接觸後」(post-encounter)，是一個外來者、殖民者、定居者的歷史觀，原住民在接觸前好像是「沒有歷史的民族」(people without history)。

我之所以提出一個不同的歷史觀，主要是在本體論的層次，提出「台灣為世界的一部分」，即使在不同時代扮演不同的角色，一直都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不是與外來者接觸之後，或某個特定時間點才進入世界史的進程。以此類推，如果台灣為世界的一部分，

<sup>6</sup> 有關講者在這一方面相關的討論，中文可參考：史書美，2017，《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第四章；史書美，2023，《跨界理論》，台北：聯經，第二章、第四章；英文可參考：Shih, Shu-mei. (2018). Linking Taiwan Studies with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1, 209-216; Shih, Shu-mei. (2016). Theory in a Relational Worl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53(4), 722-746; Shih, Shu-mei. (2013). Comparison as Relation. In Rita Felski & Susan Friedman (Eds.), *Comparison: Theories, Approaches, Uses* (pp. 79-98).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up>7</sup> 曹永和，2016，《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頁 11。

<sup>8</sup>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頁 19。



那台灣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我對世界文學的基本定義是世界上所有的文學，這個看法和很多有價值判斷的、新進比較常被討論的「世界文學」定義是格格不入的。

自從國家形式在 17 世紀西發利亞合約的簽訂，伴隨 19 世紀民族國家的興起，變成了世界組織的主要模式之後，所有文學都增添了以國家為單位的組織模式，所以文學被賦予國族性，是結構性的需要。很多文學也尋求自己的國族性，用以建立國家意識，或在世界文學中建立自己的特色。因此，所有國族文學的形成，都包含最基本的一個矛盾：一方面文學應該表達人之為人的共同經驗，所以文學研究隸屬於「人」文研究（humanities），有普遍性質，但也要表達在地的國族建構的需求，尤其是國族建構的情感需求，因此也有特殊性質。

所以今天我們才會問，台灣文學的國族性對台灣文學朝向世界是助力？還是阻力？其實這是國族文學內涵矛盾的顯影。另外，我認為我們通常談「世界」時，它的能指是西方，所以朝向世界，就是如何在西方獲得認可的意思，我們也不妨問為什麼我們那麼需要西方的認可。當然，這個課題和台灣本身的前途有關，不得不關注。事實上，這是從國族意識出發的問題，也就是說，它的出發點是以國族性和世界性的矛盾為前提的。最終說來，是一個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的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在本體論的層次認知台灣文學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時，我們問的問題可能就不一樣了，因為台灣文學已經存在於世界中，不需要特意朝向世界。那我們是不是就什麼都不做就好了呢？這就需要回到前面提及兩種存在的模式，台灣在世界的存在變成有心的存在，那我們需要做些功課。

我們可以做的功課在哪裡呢？台灣文學需要台灣境外的世界的認可，我們如何做呢？我認為我們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就是繼續開展一系列問題：台灣文學如何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有哪些組織原則或方法？台灣文學在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促進世界文學，對世界文學的貢獻在哪裡？台灣文學的能動性在哪裡？我們研究台灣文學，又如何將台灣文學「放回世界裡」研究？這些問題屬於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層次，在下一個問題的回答再進一步和大家分享。

**翁聖峰：**

謝謝史書美教授，她與曹永和教授的研究進行對話。剛剛看到邱貴芬教授的簡報，後面好像會提到台積電。這幾年半導體在先進製程產能，台灣位居領先地位；另外烏俄戰爭的國際局勢，許多人也聯想到台灣，如台灣的地緣政治處境、台灣文學的發展，這些都引起大家的關注。接下來開放現場聽眾提問。

**提問人一（陳耀昌，作家、醫師）：**

謝謝四位教授精彩的論述，我對邱貴芬教授的一句話很有感慨，她說 nation 或 nation-state 會挑動敏感神經，剛才的報告也在討論文學的國族性。我是醫學背景，本身是骨髓醫師，我也對台灣人的基因發表一些文章。後來很多人來問我，要如何確定台灣民族的基因？對我而言，我不需要有「台灣民族」這四個字。其實談到國族就已經政治化，這是我的一點想法。

**邱貴芬：**

我回應一下陳醫師及剛剛三位教授。雖然國外對於國族主義充滿懷疑，這背後當然有各自複雜的原因及歷史，但看回我剛才提的兩個案例，如台灣之所以進到 science fiction 的領域，是因為它是來自台灣的科幻小說，另一個例子就是 Brill 出版社的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新版的設計。即使在 1988 年的初版沒有台灣文學，可是時代變了，到 2026 年的新版把台灣放進來，雖然它將 China、Hong Kong、Taiwan 並置，但還是因為是台灣文學，因此就受到注意。所以我認為這其中有很多弔詭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回應到三位教授的發言，我認為我的關懷好像有些不同，我要談的不是台灣文學是什麼，或是台灣的特殊性在哪。我關心的不是本體論，或是台灣跟世界的關係。假設台灣已經在世界裡，那當然沒錯，我們早就存在了。我關心的是何以台灣在世界裡，但世界卻看不到台灣？台灣該如何被看見？台灣的聲音能夠怎麼樣被凸顯？我的關懷比較放在這裡。

對世界文學的理解，我也有不太一樣的看法。我認同 David Damrosch 的看法：世界文學不是世界上所有文學的總和，而是可以跨越國界旅行各國的文學作品。所以即使台灣在世界裡，台灣文學也不見得是世界文學，至少多數作品不是。為什麼？如何面對這個問題？回應這個問題？這是我的探問。很多台灣作家他們關心的是，他們自認為寫出很好的東西，為什麼世界看不到，反而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國外的文學作品？我想這是我現在比較關懷的問題，而不是台灣文學是什麼？台灣文學有許多世界文學的成分，對我而言是無庸置疑的。但是有世界成分的台灣文學如何成為世界文學？這是我想叩問的問題。國族的定位真的是障礙嗎？或可能是助力？

**史書美：**

貴芬教授的問題，事實上是政治經濟的問題。文學本身也有文學研究、文學史的問題。

題，裡面都有政治因素。在台灣，這個經驗是大家最深刻的，在台灣之外也一樣。所以國族認同就變成台灣進入世界的一個阻礙，因為有人說你不可以是一個國族。像加勒比海有些地方仍是歐洲的殖民地，例如馬丁尼克是法國的殖民地，但是馬丁尼克的知識份子都渴望有自己的國家，大家熟悉的法農（Frantz Fanon）從馬丁尼克去阿爾及利亞參加獨立戰爭，因為他在馬丁尼克無法爭取獨立。所以文學與戰爭、政治經濟有密切關聯，乃至於某些文學為什麼不被人所見，都是息息相關的。這些是如何去獲得認可的問題，很好的作品需要被翻譯，是實際要去處理。

再來，我想假設貴芬教授去詢問指南的主編，可否將書名更改為「Chinese and Sinophone Literature」？或許問過，但他不同意。之前邱貴芬教授和張英進編的專書就使用 Chinese and Sinophone。<sup>9</sup>因為地緣政治的因素，台灣的能見度越來越高，可以要求的權力也越來越大；假設我們拒絕參與指南的編選，也許他會找其他學者，但做出來的結果不如預期，所以我提出有條件的參與，是認為現在台灣有立場可以爭取自己的條件。甚至，如果完全拒絕參加這個計劃，另外以台灣的名字編一個指南應該也很好。我自己是越來越覺得要表態，拒絕以自己不喜歡的方式參與。

所以就像題目說的，國族性可能是一種阻力，但是勒奎恩在讚美吳明益時也說「台灣能夠給予世界什麼？」，彰顯了台灣這個國族性有用的地方。所以國族性和世界性本來就是一體一面，不是一體兩面，這是我的看法，而一個文學沒有認同，人家不知道把你放在哪。所以像文學史也都有國族認同的身份，無論它具有多少的普遍性，都會被貼上認同的標籤，因為民族國家的形式，是我們目前組織世界上各種關係的必要單位，無法迴避。

### 林芳玫：

當我們去問「為什麼台灣文學不被看見？」，我們可以逆向思考「奈及利亞文學是否有被看見？」我們身為台灣人，是否關心過奈及利亞文學、非洲文學或泰國文學？台灣人喜歡到泰國觀光，認為風景宜人、物美價廉，但是我們關心過泰國文學嗎？這個關心與閱讀的過程，牽涉到認可機制的問題，而我較不會擔心台灣文學是否被看見，不同的學者也可以從各自的位置繼續努力耕耘，如邱貴芬老師做的是最直接也最重要的事情，讓台灣文學被世界看見；我做的事情則是我已經在台灣，我認為台灣就已經具有在地性與世界性，因此我關切的是台灣文學研究如何在問題意識、研究方法、研究主題上，

---

<sup>9</sup> Chiu, Kui-fen & Zhang, Ying-jing (Eds.). (2021). *The Making of Chinese-Sinophone Literatures as World Litera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能連接在地性與世界性。

我為什麼提到奈及利亞？因為我在研究所時期注意到羅曼史這種文類，而奈及利亞曾經是英國殖民地，他們會以英文寫作，因此奈及利亞有很多用英文寫成的羅曼史跟言情小說，進而有學者開始研究奈及利亞作家用英文寫的言情小說。所以國族認同的意思並不是說作家刻意的表達身份，而是指他人與研究者的觀點，在研究奈及利亞文學的羅曼史，就必然有奈及利亞的框架。

文學被看見的方式有很多種，我去參加國際性的羅曼史研討會時，每個與會者的經驗都不同。我較常參加以類型或主題為宗旨的研討會，所以我不曾遇過不能使用台灣這個詞，也有可能是我參加的研討會不會有中國人參加。因此我在參加羅曼史研討會時，有人談奈及利亞、有人談印度，我則是談台灣，都沒有問題。也是藉由研討會，我才瞭解其他類型的羅曼史，如伊斯蘭教的羅曼史，或美國黑人的羅曼史，都是過往我沒接觸過的。

所以國家不是指作者本身要刻意去表現國家認同，而是國際學術會議以及編書時經常用到的分類單位。我們從事研究的時候，要具備一個問題意識：台灣已經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我們如何將「作為世界一部分的台灣」與世界的另外一部分產生互動。以我前面提及的文言文為例，與謝雪漁同時期的左秉隆是當時清朝首任派駐新加坡的領事官，留下大量有關南洋人文風土的詩詞，<sup>10</sup>在此，我們就可以文言文出發，將謝雪漁與左秉隆連結產生關係。所以我們需要做的是將台灣文學研究的問題意識與方法更新，思考如何與他人連結，而台灣文學如何被看到也很重要，邱貴芬教授對此有很大的貢獻，我的關懷則是在地已然就是世界，我們要努力去看到歐美、西方以外的非洲與亞洲。

**黃美娥：**

剛剛三位老師都提出對今天議題的一些解讀跟切入的方式，2020 年我在台大出版中心主編《世界中的台灣文學》，當時學校要求我編台灣文學的教科書，這是我編書的背景。這個過程我在思考如何用不同角度重新討論台灣文學，同時我一直感受做為一個台灣人並沒有很快樂，整個心情是鬱悶的，因此我想也許我要把台灣帶到世界的高度思考台灣文學，讓大家感覺到我們其實是世界的一份子，尤其是疫情時期你會發現沒有辦法置身於世界之外，後來我開始編這本書，這是我下個部分要談的。

回到剛才書美教授所講到本體論的問題，台灣跟世界的關係會是什麼？書美教授談

---

<sup>10</sup> 左秉隆著、林立校註，2021，《勤勉堂詩鈔：清朝駐新加坡首任領事官左秉隆詩全編》，台北：時報。

到在地與世界，或是我剛才報告中不斷辯證國族性的邊界及其內在指涉的範圍，我們到底要賦予它多少內容物？這過程就等同我們重新詮釋台灣文學的國族性。前面我們三個人基本上都在討論國族性內容物的詮釋方法，貴芬老師所講的部分，則是稍後第二階段會去關注的問題，就是台灣文學要如何走向世界？上星期我收到兩個國家的博士生想來台大訪學的來信，第一位來自西班牙，我查詢以後了解他的學校是西班牙人文類的頂尖院校之一；第二位來自加州柏克萊大學，兩位分別要研究林央敏的母語文學及台灣傳統文人洪棄生，以往我都沒有收過這樣的信件，這兩位學生都希望來台大進行研究，詢問我是否能擔任他們在台灣의 指導老師。我認為這個現象與台積電及國際的地緣政治現況或多或少都有關係。

今天工作坊的提問有意義的地方是我們現在到了一個時機點，就是我剛才提及一月份在東京開會時，國外學者認為台灣文學的特色是政治小說，而政治小說與國族、歷史、認同是綁在一起的。當全世界開始關注台灣的某些特質，在這種情形之下變成我們要如何走出去。因為我是在地的學術訓練，我對於比較文學或世界文學的態度，是回到在地思考。我編輯專書時納入同志、生態議題，也包含通俗文學，嘗試從人類共同的歷史經驗去思考某些議題，而這些對全世界來說是普遍存在，或會面臨的挑戰。以此來了解台灣文學，我認為很重要的是從內部認識台灣，理解我們與世界是共通的，或找尋與世界共振共鳴的共同關懷。如此一來，我們對於看待台灣自我的角度，觀點位置就會有所不同，就有可能啟動一連串新的視野，去詮釋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這是我編輯專書的構想。

**翁聖峰：**

謝謝黃美娥教授。四位教授都有非常精闢的論述，但也保留許多問題。另外，剛才提到黃美娥教授主編的《世界中的台灣文學》，書名的台使用筆劃較少的「台」，不是政治性影響筆劃較多的「臺」，我任教單位也使用筆劃較少的「台」，這些大大小小的現象都會開啟許多不同的討論。

## **二、台灣文學走向世界，是否可以跳脫國家的框架？如何以類型、傳播型態、讀者、語系、空間性／時間性等其他概念來取代國家？文學史如何成為世界史？**

**翁聖峰：**

延續上半場對國家與國族性的討論，第二階段會談到類型、傳播型態、讀者、語系、

空間性／時間性等概念。有部分在第一階段已經提及，這也凸顯兩個問題之間的關聯性，而不同類型彼此之間也會因其特殊性會相互衝突。接下來請邱貴芬教授報告。

### 邱貴芬：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認為類型的概念無法取代台灣。前面提到吳明益的案例顯示，即便類型文學仍需台灣。同樣的道理，「台灣」在語種文學如 Chinese literature 或 Sinophone literature 裡也因其特殊性，與中國、香港、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不同，無法取代，並不會因有 Chinese literature 或 Sinophone literature 這樣的語系文學概念，便不需要「台灣」文學。不過我認為在不同語種概念下的台灣文學，會因為語種框架的定義與偏好，所選擇的文本和作家有所不同。我的問題並非 Chinese literature 是否應該存在？或是像書美教授開創 Sinophone literature 一樣試圖提出一個新的概念。我經常面臨的挑戰是台灣文學如何參與各種概念的文學類別（無論是類型或是語系），因為如果選擇退出，那可能就沒有機會發聲。以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為例，初版是 1988 年出版，直到 2026 年才有第二版。初版沒有台灣文學，2026 年這個更新版把台灣文學詞條加入。我選擇參與，並在這過程嘗試重新定義 Chinese literature，使它能否不再是中國文學，而是華文文學，然後在此當中讓台灣的特殊性能夠被凸顯，也就是台灣的存在及重要性在這個出版計畫當中找到屬於它的位置。

我發現有個現象值得我們關注：在 Chinese literature 中國文學或華文文學這種以語系為主的概念裡面看見台灣文學時，會選出哪些代表作家？是余光中、楊牧？或是賴和、吳明益、瓦歷斯·諾幹？這是個有趣的問題。我曾經跟書美教授提過，我發現把台灣文學放在 Sinophone literature 框架內時，評論家往往偏好原住民族作家與馬華作家，相較之下，Chinese literature 跟 Sinophone literature 偏好的作家顯然是不同的。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為什麼會有如此差異？這些作家都代表台灣，可是他們的特殊性是不一樣的，所認知的「台灣」也不盡相同。台灣文學進入各種不同框架的路徑不同，作家也不同。台灣文學在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世界文學這些不同的概念裡的發聲情況都不同。這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以前提到台灣，大部分人不知道台灣在哪裡，現在世界上可能只有少數人不知道。近期我在希臘碰到一個義大利旅客，他說 everybody knows about Taiwan、everything comes from Taiwan，我想他說的是台積電或是台灣科技產品。現在全世界各地都爭取台積電在他們國家設廠，但是卻發現台積電在台灣的成功模式，在其他許多國家無法複製。例如在美國的設廠就遇到一些挑戰，在中國也是一樣，這或許是台灣文化的特殊性造就了台積電的成功。因此現在教育部的 Taiwan Studies Project 在考慮，或許台灣研究計畫

可以與台積電的設廠並行，比如台積電在熊本設廠，教育部也在當地設立 Taiwan Studies 中心，研究台灣文化的特性，現在推廣台灣文化的國際能見度或許是個契機。

接下來談第三個問題，文學史如何成為世界史這個問題，這不需要我回答，因為已經有許多學者做出示範。《文學群星會》<sup>11</sup>討論冷戰結構下的文學傳播，當時台灣文學已經有現代主義文學，陳建忠、單德興、王梅香都有很精彩的論述，張錦忠也討論冷戰時期現代主義在馬來西亞的興起以及與其他地區的交流。我最後再舉一個案例，之前姜學豪談到 queer fiction，酷兒的領域台灣也有紀大偉的《同志文學史》<sup>12</sup>，它的副標題是「台灣的發明」。當我們談 Sinophone queer 時，Sinophone 是一個 category，queer 也是另一個概念，但我想兩者都無法取代台灣，而且它們是並存的，因為台灣特殊的環境，談到 Sinophone queer 時，我們一定知道台灣的 queer 跟中國、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的 queer 是不一樣的。我認為每一個地方都有它的特性，我們就可以研究 queer 在台灣的发展，這其中有許多可以比較之處。

**翁聖峰：**

謝謝邱貴芬教授，她去年出版的專書《台灣文學的世界之路》，探討更多議題。接下來請黃美娥教授報告。

**黃美娥：**

延續第一個問題未回答完畢的，我想額外提出台灣文學外譯的部分。昨天查資料時，我發現文化部在網路上有一份翻譯訊息，說是截至 2022 年已經累計 348 冊書籍，涵蓋 26 種語文，如吳明益的《複眼人》有加泰隆尼亞文的翻譯，另外《賴和全集》的小說卷被翻譯為衣索比亞的阿姆哈拉文，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我在思考外譯時，我們注重的是國族性、世界性、台灣性、政治性、文學經典性？還是商業消費性？比如日文外譯屬於最大宗，顯示台灣與日本密切的關係；或是劉旭恭《車票去哪裡了？》繪本作品翻譯為波羅的海三小國之一的愛沙尼亞文。當我們談到朝向世界、文化翻譯時，我對文化部這一系列翻譯的出版品認為有意思的是，他們對於世界的想像是什麼？

進入第二個問題，我想以國家文學而言，從國族認同到國家文學，會談這是因為我們是小國，我們的文學無法走出世界，這背後隱含了西方歐美霸權，還有現階段文學研究對跨文化的關注。因此以國族、國家為標榜，預設跨文化的思考，因此我們提出這個

<sup>11</sup> 王梅香、陳榮彬主編，2023，《文學群星會：從海明威到「今日世界」的現代主義》，新北：木馬。

<sup>12</sup> 紀大偉，2017，《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台北：聯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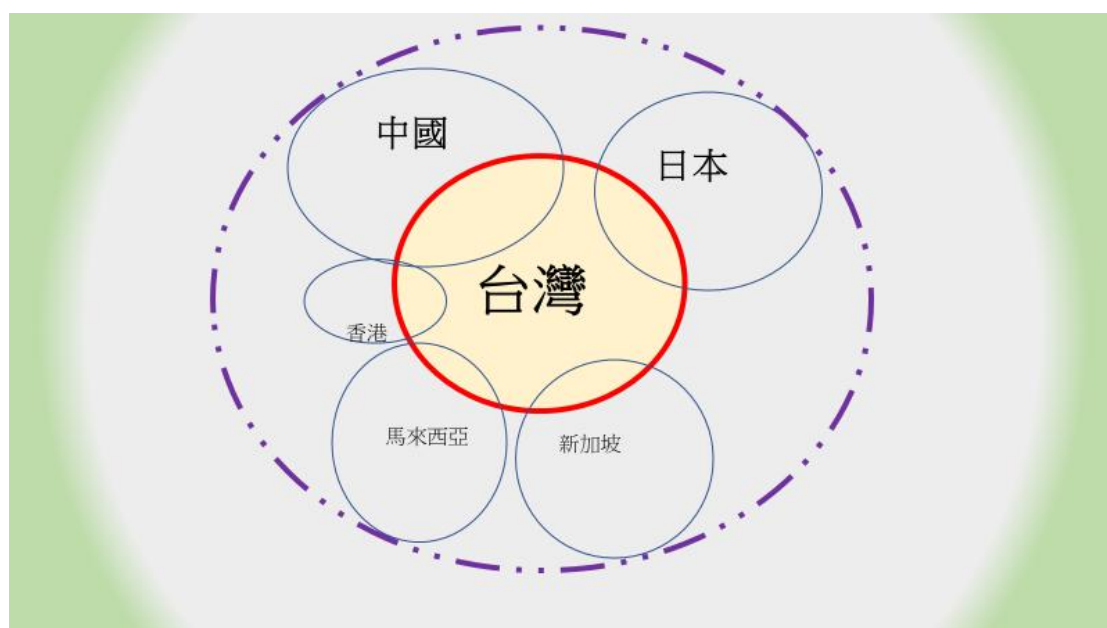
問題意識。但反面而言，如果全世界對於台灣仍不甚瞭解，那麼優先展示台灣的國族性，在當前地緣政治危機之下全世界關注台灣的位置時，可以將危機變為轉機。

回到《世界中的台灣文學》，跟貴芬教授相同的是，我也認為台灣文學有些類型充滿世界性的議題，包含同志、生態、現代主義等，因此在編輯時我選了十個主題進行討論，如日治時期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世界文學的接受、殖民問題的抵抗與反思、普羅左翼文學，左翼文學其實是世界性的問題。還有族群／種族、美援文化、現代主義、通俗文化與全球化、同志、原住民、環境文學等，我從這些議題去思索台灣文學跟世界之間的關係。

再來我特別就今天的題目思考，台灣文學的世界史研究，我們可行的路徑。首先，台灣文學本身就具有亞洲性與世界性，剛才提過世界性，亞洲性可見於日治時期台灣左翼文學，與上海、日本、蘇聯的左翼文人或思潮都有連結，前行研究都有許多討論。第二，芳玫教授剛才提及漢文學與東亞漢字圈，我想提魏清德這個例子。魏清德是《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1924 年茅原華山來台和他結識。這位曾經對李大釗產生思想影響的日本著名政治評論家，他發現魏清德漢學素養很深厚，因此邀請參與他在日本東京主辦的《內觀》雜誌，並且專為魏清德闢設「詩壇」，聘任主持這個項目。透過「詩壇」的運作，魏清德作為被殖民者，卻能在日本內地擔任詩壇的詞宗，負責挑選亞洲各地來稿。第三的案例是瓊瑤，她的作品在越南被大量的抄襲盜版，在此我們可以思考台灣作家在亞洲的傳播與接受，除了前面之外，其他如對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影響等等。從若干具體的文學作品跟作家，我們都可以看到台灣文學的亞洲性與世界性，甚至案例還可以包括劉訥鷗如何影響中國的新感覺派，其中尚有許多值得我們去探討。

回到我在台灣文學研究的經驗，2011 年籌辦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時，我設定的題目為「台灣文學史邊界的擴大」。其實，從 90 年代我進入台灣文學研究以來，就常被許多人問到「台灣文學是不是十年就研究完畢？」的問題，當時我為了證明台灣文學是我這輩子無法研究完的，所以我努力擴大台灣文學研究的邊界，這個過程也是我逐步走向亞洲與世界可能性的路徑。我與書美教授不約而同的在 2008 年開始關係性的研究，書美教授處理比較文學關係性的問題，而我的目的是促使台灣文學研究邊界的擴大。在簡報上我有一個圖示，當我研究台灣文學與日本的關係，或是台灣與其他國家區域的文學關係時，我的研究邊界就會擴大。這個策略，也會讓其他國家的學者對我的研究感興趣，因為我碰觸到他們的邊界。那個時期我透過教書與研究，去進行文學「關係性」的思考。





台灣文學關係性研究示意圖

近年來我回到國族性思考另一個問題，我們的領土包含台澎金馬，但是文學史都沒有金馬澎。2021 年台灣文學學會的研討會，我規劃以「台灣大文學史的建構與想像」為題，從大文學史思考島嶼的問題。島嶼研究到後面會涉及群島研究，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的群島研究將世界群島化，或更白話來說，世界是一個大群島。我在上課時，會談到金門是南洋僑鄉，也是冷戰反共戰地，而在小三通政策中更是兩岸的節點。再如澎湖，Discovery 拍攝的紀錄片《迷樣澎湖》將其稱為東方的百慕達三角洲，過往有許多沈船，底下有海底文明，而歷史上澎湖也可能是海上絲路的一部分。劉吉雄紀錄片《彼岸他方》在加拿大播映，研究冷戰時期的澎湖成為越南難民營，我自己則研究過澎湖七一三事件的文學書寫。每個島嶼都有它的前世今生，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從個別島嶼追索從過去到現在的演變。剛才書美教授提到曹永和教授的史觀，曹永和教授的島嶼史觀，非常強調與海洋的關係。我想從島嶼研究可以為我們帶來新的思考點，因為島嶼透過海洋連結了世界。我最近協助杜國清教授編輯台灣文學英譯叢刊，我策劃專題「島嶼視線：台灣文學新風景與新論域」，就是從島嶼的角度去介紹不同島嶼的文學作品，進而帶出一些觀點，我將曹永和與格里桑並置討論，思考台灣如何注意到島嶼和表現島嶼性。

最後我想談文學史新形態傳播的問題，文化部台灣文化入口網的文學工具箱、中興大學的台灣文學大典，都是數位時代的產物。對此，邱貴芬教授作了很多的努力，貢獻很大。近期我注意到故事 StoryStudio 團隊進行新台灣史運動的計畫，整合圖文影音的新媒介與新視角。他們提出時間上不以政治為唯一的分界斷點，空間上打破台灣史與世

界史的區隔，他們在做的，其實也是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在未來文學領域，或可參考借鏡。

**翁聖峰：**

謝謝黃美娥教授提出很多不同的角度提供思考，《世界中的台灣文學》收錄十位學者不同領域的研究，林芳玫教授有關瓊瑤作品研究最新的討論也收錄在此。林芳玫教授近年來對歷史小說的族群與性別的研究也累積許多成果，接下來請林芳玫教授報告。

**林芳玫：**

我將分為四個部分討論第二個問題：第一，何為朝向世界；第二將以《想像的共同體》討論文學史如何成為世界史；第三，以轉型正義為主題討論台灣已經是世界的一部分；第四，台灣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其中數位科技的影響。

工作坊的題目是朝向世界，直觀而言，好像世界在他方，我們還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我們要朝向世界。但題目的另一層意思是，台灣已經是世界的一部分，台灣的文學、文化、學術研究如何因為問題意識、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得我們改變世界。我們一方面受到世界的影響，一方面也在影響世界。所以朝向世界的意思是我們已經在世界，但是世界之所在的 **being** 不是靜態的存在，是動態的存在，與不同國家、文類持續互動，所以朝向世界是我們可以影響世界、改變世界。

第二，文學史如何成為世界史？如果細讀《想像的共同體》，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到民族國家的出現與印刷資本主義有密切的關係。殖民地在爭取獨立的過程，小說扮演重要的角色，如何脫離殖民者的語言，使用本土語言，而像越南語沒有書寫形式，要如何使用羅馬拼音呈現越南語？因此民族國家的建構，小說成為重要的文類，這也是為什麼賴和是研究台灣文學的一個起點。之前觀賞作家吳晟的紀錄片《他還年輕》，最後一幕是吳晟環顧賴和的書房。賴和的藏書涵蓋各國的文學作品，也包含菲律賓文學之父黎剎（José Rizal）的小說。我非常訝異，黎剎的文學作品被翻譯成中文，並且有讀者。我們反過來思考，或許世界上某個角落，也有人用不同的語言在閱讀台灣文學。

第三，以轉型正義這個主題類型，思考文學史與世界史的關係。在第二波、第三波民主化過程中，前威權國家在邁向民主化時有轉型正義的過程，回顧歷史進行記憶的重構，書寫過往的威權主義。目前我在指導的博士生是西班牙人，他認為西班牙與台灣的民主化過程有諸多相似之處，但相關研究付之闕如，因此他以西班牙與台灣轉型正義電

影為題目進行比較，巧合的是，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與蔣介石是同年過世的。另外，我指導的那位博士生來自加那利群島，所以他知道三毛，這也看出三毛是 Sinophone studies 最好的案例。一般西班牙人應該不知道三毛，但是他在加那利群島，所以他知道。加那利群島相對於西班牙本身處於邊緣位置，因此他對台灣的邊緣位置感興趣。現在許多學者研究轉型正義的文學，我之前讀到一本書籍，是由加泰隆尼亞文直接翻譯為中文，背景是佛朗哥統治時期。作為一個台灣人，讀完以後深有感觸，佛朗哥與蔣介石的統治有許多類通之處。這本書的作者在寫作時，或許沒想過他的書會被翻譯為中文，而台灣有一個人閱讀他的作品。在台灣的文學創作會流通到世界各地，同時我們也會閱讀來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學作品。

最後提到新科技及文學轉譯，去年台灣文學學會年會「台灣文學與跨媒介轉譯」收到廣大迴響，討論內容涵蓋電影、漫畫、舞蹈、戲劇、電子遊戲。而我在課堂上有位加拿大籍學生，他提到返校 *Detention* 這款遊戲，後來改編為電影。遊戲背景為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透過電玩帶來的刺激、緊張體驗感受，讓玩家身臨其境。如果以傳統的歷史教學法與年輕人談白色恐怖，多半不會感興趣，但返校透過電玩以及電影改編獲得很大的成功。回到文學，我們不僅要拓展台灣文學的邊界，也必須重新思考文學的邊界是什麼，以及文學在未來如何用不同的媒介呈現。

#### 翁聖峰：

謝謝芳玫教授有關台灣跟西班牙的比較及台灣文學轉譯的對話，有些互動是我們沒想過的，芳玫教授提供許多思考的空間。接下來請史書美教授報告。

#### 史書美：

我同意在方法論的層次上，我們有不同方法著手台灣文學的研究，因此我也從這個層次回答問題。

我們今天討論的第二個大問題對我來說是知識論與方法論層面的。知識論是本體論的發展與應用，為方法論的基礎。當我們認為「台灣是世界的一部分」的本體論前提之下，我們首先要推翻台灣不重要、台灣文學不重要、台灣文學很小這樣的自我侷限的認知。比起很多大家公認文學很強的國家，台灣事實上並不小：英國只有台灣的 6.8 倍、希臘只有台灣的 3.6 倍、捷克和愛爾蘭只有台灣的 2 倍，而加勒比海的出過諾貝爾獎得主的聖露西亞只有台灣的 0.01 倍，加勒比海生產好幾位後殖民理論家的馬丁尼克也只有台灣的 0.03 倍。國家大小與人口多寡也許與文學作品產量有關，但是不一定與文學作品素質好壞有關。以上我提到的這些國家就是非常好的例子，都有很多世界聞名的作

家和作品，所以和大小無關。更何況，我認為台灣即使面積很小，台灣的文學非常豐富多樣，非常有成果。

所以如果我們用「台灣為世界的一部分」的知識論為其能動者，改變原來侷限性的觀看和思維模式，我們用什麼方法去了解台灣和台灣文學？我建議其中一個辦法，就是用世界史的眼光來看台灣和台灣文學。從海洋台灣的認知看、從南島語族圈來看、從台灣在世界經濟史上扮演的角色看等等，都可以看到台灣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所以在知識論的層次上，我們還要繼續下功夫，把這樣的歷史現實彰顯出來。我以為我們可以把台灣文學放進世界史的框架去討論，而這就是方法論的層次了。這樣的方法，是從本體論到知識論到文學研究操作問題一貫下來的。

台灣文學如何用世界史的框架為方法？世界史聽來很大，好像很難做似的，但我認為是知難行易的，不需故步自封。我想以賴香吟的小說《白色畫像》為例簡單討論。這本小說分為三個部分，講三個台灣人在不同時代的遭遇，從日治時期到白色恐怖時期，一直到解嚴之後，主要還是以記憶白色恐怖對人們造成的生命裡深沉的負擔和創傷為主，但是它的時間軸基本上包括整個 20 世紀。第二部的文惠女士在日治時代當女傭，受到日本雇主的教養，並不認為低人一等，但是在白色恐怖時期，這樣的現象改變了。在台灣，對日本時代保有相對正面的記憶，由此我們可以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相對來說不同的分析和批判。帝國研究是世界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項目，卻很少研究日本帝國和中華帝國的，《白色畫像》可以對帝國研究的歐美中心主義提出有力的挑戰。其他專門以日治時期為背景的小說，這一方面的呈現更是多樣和豐富，可以看到台灣文學對世界史中的帝國研究的建構和概念有舉足輕重的貢獻之處。小說第一部的清治先生，一生大部分是在白色恐怖時期度過，正好對應中國和其他共產極權國家的紅色恐怖，是冷戰時期世界史最典型也最主要的歷史經驗之一。小說第三部的凱西小姐，在同樣的白色恐怖時期，身為台灣人，在台灣的發展有限，於是到了歐洲。她這時期是在法國度過，竟然遭遇到法國巴黎 1968 年的五月風暴，讓她認識到「原來革命不是死路一條的事」<sup>13</sup>，自由其實是可以追求的。然而，凱西小姐對五月風暴的反應也特別典型。她雖然一方面感覺心動，但是她基本上還是冷漠處之，她感覺「自由的滋味好複雜，地鐵停了，銀行關門，郵差也不送信」。<sup>14</sup>台灣白色恐怖的經驗已然讓她迴避任何和政治有關的事情，眼前的生活細節才值得關注。這是那個時期很多人的保身術，她已經離開台灣了，也放不下這樣的保身術。大家知道，五月風暴是法國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啟發點，其前其後的各亞非國家獲得獨立，都是世界史上全球革命的 60 年代一部分。台灣在世界革命的 60 年代中的角色，就是革命的 60 年代所排斥的冷戰的戰略角色。但是沒有冷戰，就沒有革命的 60

<sup>13</sup> 賴香吟，2022，《白色畫像》，新北：印刻，頁 182。

<sup>14</sup> 賴香吟，2022，《白色畫像》，新北：印刻，頁 183。

年代，兩者是共構的。

我們可以看出，《白色畫像》本身就有非常豐富的世界史的背景，把台灣和日本、歐洲、中國連結起來。因此我們研究它的時候，更需要有世界史的視野。但是，也許有人認為這部小說其實是很本土的，因為它敘述了台灣特殊的歷史經驗。在此我們看到國族性和世界性的相通之處，不是一體兩面，而是一體一面。另外，我再舉一個例子，把冷戰時期的美援文化看作是世界性的事件。我們可以看一下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小說描述一個窮困的工人被載著美國人的車子撞斷腿，理當是非常憤怒的。但當這個美國人安排他到醫院治療，帶了蘋果給工人一家人吃，給他們安慰金，也安排把啞巴女兒送去美國讀書，工人一家人竟然覺得這是天降大福，感激不盡了。這本小說可以說是對冷戰時期的美國新殖民主義的一個諷刺，進而提供給我們在世界史的語境下來看台美關係為一種殖民關係。美國主義在台灣盛行，可以納入我們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批判，那也許我們可以說，這樣的台灣研究的方法，也同時屬於美國研究的領域。美國那麼大，這樣台灣研究就不「小」了吧？

另外，在語言的問題上，《白色畫像》有很創意性的表現：清治先生看到比他年長的一代人由於日語到華語的語言轉換的問題而失落，包括閩南語被噤聲等，對文字轉換和語言轉換的這個問題，有相當好的處理。另外，小說中賴香吟用漢字直接書寫閩南語，也參插很多日語，是一個標準的多語作品。對小說中多種語言關係的深入的探討，也勢必可以對多語文學的概念，語言文字轉換的概念等，有很多的新的概念可以貢獻給世界文學。在此，語系的框架就很有用，各種華語語系內的各語言：標準華語、閩南語、客語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也可以連結其他華語語系文學和日語語系文學，也可以對英語、德語、法語等小說中出現的語言做一個分析。這裡的眾生喧嘩不是華語的「華」字，而回歸原來的喧嘩的「嘩」了。

如此以世界史為角度或方法，當然還不夠。我們還是需要做更細緻的文本分析，但是細緻的文本分析和世界史視野的分析是相輔相成的，也就是作品的文學性和世界性並非一體的兩面，而是一體的一面，混沌形成，相互構成，不可分割。

**翁聖峰：**

謝謝史書美教授，她特別提到賴香吟的小說，並且扣合台灣歷史文化的發展。史書美教授也有許多精彩的研究，過往殖民研究較關注海洋殖民，剛才書美教授提到華語語系研究與大陸殖民。我們過往習慣以漢人角度思考，若從原住民的角度看待台灣史或台灣文學，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剛才幾位講者也提到原住民族文學與馬華文學在台灣

位置，台灣文學跟邊疆、離島的關係。有些國家的規模與台灣相等，但生產出更為豐富的文學，這些現象都值得我們思考。接下來進入提問環節，待聽眾提問後四位教授再統一回應。

**提問人二（林淑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

今天講者談到冷戰、轉型正義、島嶼、新媒體等議題。我目前從事記憶研究，記憶是關於時間與空間的問題，我想了解如何以「台灣為世界一部分」的知識論呼應記憶研究？

**提問人三（侯建州，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講者談到金門、菲律賓，與我的研究領域有部分重疊。美娥教授在台灣文學邊界擴大的圖示中，並未包含菲律賓，我認為有些可惜，因為菲律賓與台灣有許多連結。未來如果整合區域研究、華語語系、台灣文學不同學科進行研究時，或許能就與台灣關係密切的國家重點發展。

**邱貴芬：**

因為今天題目不是台灣的重要性，是台灣文學的重要性，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文學作品，而好的文學作品是我們去談論時能夠引以為榮的，再來是必須要翻譯以及如何翻譯，這些問題都頗大。另外我們要面臨文學的式微與科技的挑戰，<sup>15</sup>現在不再是文字的時代，如何去面對這個挑戰是我目前關切的議題。

**黃美娥：**

我試圖回應問題。舉例來說，現在澎湖多半聯想到花火節，要營造為世界的觀光景點。但我在閱讀王鼎鈞的回憶錄，他提出如果蔣介石以二二八事件征服本省人，那麼七一三事件就是讓外省人服從的關鍵，而鮮少人知道澎湖與七一三事件的關聯。另外我也注意到作家張放，這位作家芳玫教授也有研究過。他是書寫七一三事件最勤奮的作家，超過百部的文學創作，但有很多內容大同小異，那是一種創傷，透過不斷重新敘寫勾連記憶。

回過頭來，許多島嶼的前世今生，我們至今仍不清楚。蘭嶼有夏曼·藍波安寫出許多文學作品，澎湖有劉吉雄關注澎湖難民營，而這還與當年轟動一時的南海血書有關。

---

<sup>15</sup> 有關講者在這方面的討論，可以參考邱貴芬，《台灣文學的世界之路》，第五章、第六章。

我們對許多歷史、記憶，其實到現在都不甚瞭解。

另外一方面，再回到文學世界性的創作問題，當代作家可以透過挖掘記憶去再創造和進行非虛構寫作，如馬祖的「神話之鳥」黑嘴端鳳頭燕鷗，可以從生態、神話開展；吳鈞堯書寫金門時，便以風獅爺為主題創作《遺神》。只要將島嶼內涵的世界性元素彰顯時，作家就能夠賦予其故事，我想今天人在會議現場的作家楊双子，她應該可以具備這樣的能力。總而言之，這是一個雙向性的問題。我們可以去思索如何從記憶當中挖掘，進而連結到當代。就如同貴芬教授剛才提的，好的作家寫出好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具有世界性的視野，而世界各地的讀者，自然就會對此感興趣。

### 林芳玫：

從時間跟空間談到記憶的問題，我認為台灣文學可以說是不同記憶之間的競爭與互動。以張放為例，他是鮮少被關注的作家，但他筆耕不輟。他從山東到了澎湖不久後，就發生了七一二事件，許多山東籍的教師與學生被丟進海裡，這個事件直到近年才被討論。張放創作的時期社會仍充滿禁忌，因此他以樸素、平鋪直敘的文學手法書寫，告訴大家曾經有過這樣的事件。

平路近期小說《夢魂之地》提到大陳島，大陳島大家已經完全陌生，因此無從遺忘，平路重新在台灣記憶裡加入大陳島，這與冷戰格局、美軍都有關聯；駱以軍《西夏旅館》以西夏為名，已經並非談台灣，在談大陸帝國。他回到 11 世紀的西夏，提出非漢人觀點的歷史，以胡人及中亞取而代之。他又將 11 世紀的西夏比喻當代台灣，11 世紀有宋、遼、西夏各國互相對峙，比喻當代台灣地緣政治上與美國、日本、中國的關係。因此外省第二代作家恢復的不僅是 1949 年逃難的記憶，而是將時間向前推移回到 11 世紀，解構漢人中心的中國史觀，提出胡人為主體的史觀。台灣文學非常豐富，還有原住民、新移民，不同的文學都展現出他們的記憶，建構出多層次的台灣文學。

### 史書美：

記憶研究現在在美國非常流行。前一代人的經驗這一代沒有親臨其境，但仍保有某種記憶，這稱為後記憶或重新記憶。其中有一個問題是災難與創傷是否可以比較，在美國與德國近期有些爭論，主要在於美國原住民大屠殺、黑人奴役與猶太人大屠殺三者是否能做比較，其中牽涉政治倫理問題，比如誰的創傷較大。相對來說，這方面台灣沒有這麼多比較性的討論，但是台灣仍有不少創傷記憶如原住民、二二八，這方面可以有進一步與其他領域的對話。

談到關係性的研究，我自己還是偏好以世界史的眼光看待關係性，這不僅是台灣與周邊其他國家文學互相影響的關係性，而是指世界史的大場域內，台灣文學以何種方式參與，或以何種方式促進參與世界史進程中的事件。比如前幾年的太陽花運動，或是二二八事件。上世紀 40 年代是浩劫的年代，發生二次世界大戰。二二八事件在 1947 年，當我們將二二八放進二戰的脈絡談論時，就能看到台灣的歷史也是二戰史的一部分，從世界史的角度切入放進台灣文學。在〈放回世界的台灣研究〉<sup>16</sup>提到，台灣本來就在世界裡，但現在如何在方法論的層次將其放回，我認為世界史的角度很有用處。

最後一個問題是，把台灣放回世界，是希望誰能看見？貴芬教授關注台灣文學外譯的問題，台灣文學需要外譯才能被看見。美娥教授提到文化部的的外譯計畫，將台灣文學翻譯為 26 種語言，我認為很有趣，因為不僅有主流西歐語言。所以我們想被誰看到？為什麼被某些人看見會更高興？其他人看到，就沒有特別的感受？比如台灣文學翻譯成英文與越南文，前者受到的關注肯定較多。這回到政治經濟的問題，過往法語是世界霸權語言，現在是英語，所以我們需要獲得認可，這是政治經濟問題。事實上，我們今天談台灣文學如何走向世界，它的前提都是政治經濟。

#### 黃美娥：

我做一個補充。我在進行關係性研究的時候，出發點跟書美教授不一樣：書美教授是放在世界文學、比較文學的框架去討論如何透過關係進行比較，以達到一個世界文學研究的目的，把台灣拉到那個位置；而我的目的就如我剛剛所說，一開始純粹是大家認為台灣文學很快就研究完了，所以我一定要想辦法讓邊界擴大。我的目的是為了讓台灣文學研究邊界擴大，因此我的出發點跟方法論的設定，其實跟書美老師是不一樣的，只是說走到後面會如何發展，是我自己要努力的。

#### 翁聖峰：

今天感謝四位教授的發表及大家的參與，未來主辦單位會將工作坊對談內容發表在刊物上。

---

<sup>16</sup> 史書美，2017，《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第四章。